

「周易與東亞文化」學術研討會

《周易》與朝鮮時代文人文化：以申欽為中心

柳江夏
(江原大學)



《周易》與朝鮮時代文人文化: 以申欽為中心

柳江夏

(江原大學)

[摘要] 本文以朝鮮中期代表性文學家申欽(1566-1628)之放逐時期作品為核心，綜合探討《周易》如何在其生命歷程中獲得實踐性轉化，並在文學書寫中被形象化與審美化。透過對其流放期間詩文與易學思維之分析，本文指出，《周易》在申欽身上已由義理經學之詮釋對象，轉化為回應政治動盪與個體危機之思想資源，成為支撐其主體建構與處世實踐之精神依據。在儒學體制高度規範化之背景下，《周易》因兼具義理與象數之特質，而展現出多重詮釋可能。至朝鮮中期政局震盪加劇之際，象數思維獲得新的思想空間。申欽之放逐經驗正構成其思想轉折之關鍵，使坎卦與井卦之思索不再僅屬象數層面之解釋，而成為對苦難處境之倫理回應與存在反省。本文進一步論證，申欽於放逐期間之文學創作，呈現出將卦象思維轉譯為象徵書寫與空間構造之創新實踐。《周易》遂由「經典知識」轉化為「生命資源」，其象徵系統透過詩文語言獲得審美化重構。此一過程顯示，當政治秩序出現裂隙之際，經典並未失去效力，而是透過文學再詮釋，成為士人面對歷史創傷時之精神支點。申欽之案例，提供了一種理解經典如何在特定歷史情境中被重新建構與活化的重要視角。

關鍵詞： 申欽, 周易, 文學, 坎卦, 井卦, 象數學

一、前言

朝鮮王朝以儒學為國家統治之根本理念，中國儒家經典對朝鮮社會各層面產生深遠影響。《論語》、《孟子》等儒家經典以及中國文人之著作，長期以來持續被引介與接受。其中，《周易》所佔之地位尤為重要。《周易》早於三國時期即已傳入朝鮮半島；至高麗王朝，更設置五經博士制度，以掌經學之傳授與研究。此一學術傳統延續至朝鮮時代，不僅未曾衰歇，反而日益深化並擴展其影響範圍。透過君臣問答及「經筵」¹記錄，亦可見《周易》屢被援引，且被視為具有重要地位之經典。²

《周易》不僅在公共的政治與學術領域中備受重視，在私人生活層面亦發揮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朝鮮時期之文人多藉由研讀《周易》以闡發其政治理想，並藉此建構自身之思想體系，涵養其人生態度與修身工夫。以《周易》為媒介所開展之思維方式與認識視野，進而在士大夫個人之生命實踐與著述活動中具體化為一種內在價值與精神旨趣。作為朝鮮時代具代表性之政治家與哲學家，如李滉（退溪，1501-1570）、曹植（南冥，1501-1572）、奇大升（高峰，1527-1572）等，皆被評價為專志研讀

¹ 「經筵」一詞，於高麗及朝鮮時期，既指臣僚為促進君主之學問修養，而講授儒家經典與歷史之講讀活動；同時，在朝鮮時代亦用以指稱專司此項職掌之官署機構。換言之，「經筵」兼具制度性與實踐性之雙重意涵。

² 據統計，《朝鮮王朝實錄》中「《周易》」一詞共出現1,196次；括號內數字為各朝實錄中之出現次數。

<https://sillok.history.go.kr/search/searchResultList.do>

其具體分布如下：太祖(3)、太宗(6)、定宗(18)、世宗(26)、文宗(8)、端宗(5)、世祖(64)、睿宗(4)、成宗(111)、《燕山君日記》(35)、中宗(58)、明宗(22)、宣祖(216)、《宣祖修正實錄》(7)、《光海君中草本》(37)、《光海君正草本》(34)、仁祖(27)、孝宗(35)、顯宗(12)、《顯宗改修實錄》(29)、肅宗(103)、《肅宗補闕正誤》(7)、景宗(6)、《景宗修正實錄》(3)、英祖(113)、正祖(101)、純祖(42)、憲宗(2)、哲宗(2)、高宗(54)、純宗(6)、《純宗附錄》(1)。

此外，「《易經》」一詞於《朝鮮王朝實錄》中共出現473次；括號內數字同樣表示各朝之出現次數。其分布情況如下：太祖(3)、太宗(2)、世宗(30)、文宗(7)、端宗(5)、世祖(16)、睿宗(5)、成宗(47)、《燕山君日記》(23)、中宗(100)、仁宗(4)、明宗(29)、宣祖(40)、《宣祖修正實錄》(3)、《光海君中草本》(6)、《光海君正草本》(5)、仁祖(22)、孝宗(11)、顯宗(2)、《顯宗改修實錄》(4)、肅宗(35)、《肅宗補闕正誤》(2)、景宗(1)、《景宗修正實錄》(2)、英祖(29)、正祖(19)、純祖(13)、憲宗(1)、哲宗(2)、高宗(5)。

《周易》並深加思辨之重要學者，在朝鮮儒學思想史上具有關鍵地位。

朝鮮時代對《周易》之高度關注，亦可由口訣、譯解與注釋等詮釋活動之發展情形中獲得明確印證。經典之口訣傳統自高麗時期即已肇始，並延續至朝鮮時代而益加完備。其中，朝鮮世祖（1417–1468，在位1455–1468）對《周易》素具深厚造詣，甚至親自主持《周易》口訣之編定與整理工作，可見其重視程度。³ 世祖於頒行《周易口訣》之日，不僅舉行隆重儀式，且特別實施文科重試，以《周易》為試題核心，使儒生親身體認其於治道與修身之重要意義。⁴ 國王此種尊經重道之態度，對士大夫之學術取向與經學關懷產生深遠影響，進一步促成《周易》在朝鮮儒學體系中的核心地位。

譯本方面，則以《周易諺解》最具代表性。《周易諺解》為朝鮮時期流傳最廣、影響最深之《周易》譯本，其編纂始於宣祖（1552–1608，在位1567–1608）年間，至仁祖（1595–1649，在位1623–1649）朝方告完成，其後遂成為儒學教育之核心教材之一，在經學普及與教化實踐上發揮重要功能。此外，包括《周易》在內之儒家經典，亦有部分譯為諺文，以女性讀者為主要對象而加以刊行與傳布。至高宗（1852–1919，在位1863–1907）時期，更刊行《女小學諺解》，作為婦女教化之用書，使女性亦得以接觸儒家倫理價值與經典知識。此一現象顯示，《周易》之影響已突破性別與階層之界限，逐步擴及社會各層面，成為整體文化秩序與價值體系之一環。

相較於譯解工作，《周易》注釋書之編纂尤為蓬勃發展。權近（1352–1409）所撰《周易淺見錄》，以朱熹之詮釋為基本架構，同時提出己見，為朝鮮初期具代表性之《周易》注釋著作之一，顯示其在繼承宋學傳統之餘，亦展現自主詮釋之意識。李滉（1501–1570）則以畢生研治《周易》之成果為基礎，撰成《周易釋義》，建構一套融合義理闡發與修養工夫之易學體系。其立足於義理學之立場以解《易》，強調由經入德之修身實踐，並警惕流於占筮術數之偏向，體現朝鮮儒者重義理、抑術數之學術取向。至於實學思想家李瀾（星湖，1681–1763）之《易經疾書》，則承繼漢代象數學之

³ 根據《朝鮮王朝實錄》之記載，可知世祖曾與群臣以極為積極之態，參與《周易》口訣之編纂工作。

“命召兼藝文鄭蘭宗等，仍傳于諸宗宰曰：‘此皆俊士。予令講《易》口訣，勝者加資，負者削資。宗宰等共觀其問難。’仍命分左右而坐，問難《周易》。”（《朝鮮王朝實錄》世祖11年（1465）10月15日）https://sillok.history.go.kr/id/wga_11110015_001

⁴ Se-hyung Yun, “A Study on the Records of the sejosillok Appear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 Convergence*, 12, 2022, p.138.

詮釋傳統而加以整理與辨析，為具專門性之易學研究著作。金相岳（1754–1815）所著《山天易說》，以個人讀《易》所得之體悟為核心，並結合圖像說明以闡發易理，呈現出理論與體驗相互融攝之特色。其後，代表朝鮮後期實學之丁若鏞（茶山，1762–1836）所撰《周易四箋》，綜合前人成說而別出新解，向來被視為朝鮮易學之集大成之作；其詮釋之創見與體系之完備，使其在朝鮮時代《周易》注釋傳統中居於高峰地位。上述譯解與注釋成果之長期積累，充分說明朝鮮文人並未僅將《周易》視為經典文本之閱讀對象，而是作為持續思辨與深化詮釋之思想資源，反覆涵泳、精加研討，從而形塑出具本土特色之易學傳統。

本研究所關注者，乃朝鮮中期士大夫對《周易》之接受與運用情形。研究之時間範圍涵蓋宣祖、光海君（1575–1641，在位1608–1623）及仁祖諸朝，此一階段適與朝鮮社會內外多重危機交織之時期相重疊。對外而言，自壬辰倭亂（1592）與丁酉再亂（1597）以降，復有丁卯胡亂（1627）與丙子胡亂（1636）等戰事接連發生，國家長期陷於兵燹與動盪之中；對內則歷經仁祖反正（1623）與李适之亂（1624）等政治劇變，權力結構與朝政秩序屢遭衝擊。同時，中國正值明清鼎革之際，國際秩序劇烈變動，此一東亞局勢之轉折，亦成為加深朝鮮內部矛盾與分裂之重要因素。

如此內外交迫之現實危機與未來走向之高度不確定性，無疑加劇了士大夫階層之憂患意識與精神焦慮。據《朝鮮王朝實錄》所載，歷代王朝之中，以宣祖（1552–1608，在位1567–1608）朝對《周易》或《易經》之記載次數為最多。《周易》一書於宣祖一朝共被提及二百一十六次，即便與次高之英祖（1724–1776，在位1724–1776）時期之一百一十三次相比，亦呈現出明顯且壓倒性之差距。無論從絕對出現次數觀之，抑或考量各王在位年數之長短，皆足以證明宣祖朝對《周易》之關注達於高峰。尤有進者，朝鮮時期最具代表性之譯本《周易諺解》亦刊行於此一時段，此一文化現象自可視為當時經學熱潮之具體反映。凡此種種，皆說明在動盪不安之時局背景下，士大夫與統治階層愈益傾向於透過《周易》之義理資源，以回應政治與道德秩序之重建課題。

由此觀之，《周易》不僅為哲學思辨之重要對象，同時亦被運用於具體而實際之層面。尤以周易占而言，在巫俗活動遭嚴格禁制之社會氛圍下，士大夫階層遂轉而依託《周易》以卜筮問疑，藉以紓解對未來之憂懼與不安。此種選擇既能回應現實心理需求，又因其立基於儒家經典之正統地位，而獲得思想與倫理上的正當性，此乃其重

要優勢所在。⁵《周易》所蘊含之象徵性與隱喻性，乃至對未來趨勢之預示功能，強烈激發了朝鮮時代知識人之思想興趣。對當時士人而言，《周易》不僅提供觀照宇宙運行與時勢變化之理論框架，亦成為反省自我、涵養德性的思維資源。是以，《周易》之影響廣泛滲透於政治、哲學、文學與藝術等多重領域，深刻形塑朝鮮知識文化之整體面貌，並在思想史上占據舉足輕重之地位。

本論文以朝鮮中期「漢文四大家」——並稱「月象谿澤」之李廷龜（月沙，1564–1635）、申欽（象村，1566–1628）、張維（谿谷，1587–1638）、李植（澤堂，1584–1647）——為時代背景，而聚焦其中對《周易》抱持高度關注之申欽，擬以其生平行誼與文學創作為中心，展開深入討論。

申欽不僅以卓越之文學才華享譽於世，著述宏富，亦以幹練之行政能力締造具體而可觀之政治成就，並與同時代文人建立廣泛而活躍之交遊網絡。其自早年即對易學抱持深厚興趣；尤以《周易》為核心經典，自癸丑獄事以降所展開之艱困歲月中，成為其反覆涵泳與深思之主要思想資源。對申欽而言，《周易》並非僅止於書齋之學術研究對象，而是轉化為其衡量世變、裁決行止與指引實踐之內在依據。其易學思維，具體體現在文學書寫與日常記錄之中，呈現出義理思辨與生命體驗交織之精神軌跡。

本研究擬透過分析申欽於人生困厄時期所創作之文學作品，探討其如何將《周易》之卦象思維與義理架構融入文學表現之中，並進一步考察此種結合如何在其處世策略與日常實踐層面發揮調適與支撐之功能。既往研究多將申欽之經學思想與文學創作分別處理，對其與《周易》之內在關聯論述尚屬簡略；然其放逐時期之書寫實踐尤具關鍵意義，理應獲得更為深入之關注。此一階段，申欽不僅在文體形式上有所突破，嘗試超越既有文學範式，亦積極探索與《周易》之深層結合。本文即在此脈絡下，闡明其如何藉由象徵性與隱喻性兼備之文學語言，與《周易》之思想資源相互交融，以承擔現實苦難，並揭示其內在精神世界之展開與轉化。

⁵「周易占卜」於朝鮮王朝時期具有極為特殊之地位。雖其本質屬於占卜行為，然並未因朝鮮士大夫普遍排斥巫術活動而遭摒棄，反而於該階層中廣泛流傳。更為顯著者，在於士大夫對《周易》占卜評價頗高，甚至常親自施行或委託他人實行占卜。Yong Mok Shin, *A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of Si Zhu and Feng Shui Idea by Literati in the mid-Joseon: Focused on the Diary of Miam and Mukjae*, Ph.D. dissertation,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23, p.160.

二、從家學淵源到政治困境：申欽易學觀之生成

申欽（號象村，1566–1628）為朝鮮王朝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者與文人。其一生歷任多項朝廷要職，包括領議政、吏曹判書、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世子右賓客，以及禮曹判書、兵曹判書、刑曹判書等，仕途顯達，位居朝廷樞要。申欽不僅政治識見敏銳，行政才能卓著，且以文章名重一時，在朝鮮中期文壇享有崇高聲譽。其於古文創作方面成就斐然，被推為「漢文四大家」之一；同時，在時調創作領域亦具有重要地位，為朝鮮時調文學發展史上之代表性作家。

出身於士族名門之申欽，其對《周易》產生濃厚興趣，實與其家世背景密切相關。申欽七歲時父母雙亡，遂寄居外家，受外祖父宋麒壽之教養而成長。其自幼嗜讀，約十歲時即以文才著稱於鄉里。十五歲時，申欽娶易學名家李濟臣（號清江，1536–1584）之女為妻，因而得從李氏研習《周易》。其學問進境甚速，李濟臣甚至稱其造詣有過於己。除義理之學外，申欽亦深入探究象數之學，融會義理與象數兩端，使其《周易》之理解更為深厚而多層。⁶ 對申欽學術思想產生深遠影響者，除外祖父宋麒壽與岳父李濟臣之外，尚可上溯至徐敬德之象數與心學傳統，以及吸納道家思想之曹植學術脈絡。二者同為其家族內之學術淵源，亦構成其思想養成之重要資源。⁷ 在此家學淵源與師承關係之陶冶下，申欽不僅精通儒家經學，且對當時被部分正統理學者視為「異端」之道家、佛家及陽明學，亦能持較為包容而開放之態度，展現出兼容並蓄之思想格局。⁸

尤須指出者，申欽之疾病經驗，對其將《周易》理解為兼具實用性與踐履性的經典，應產生相當程度之影響。申欽自幼體弱多病，因而對結合道家鍊丹術與《周易》思想之《周易參同契》深感興趣。十五歲時即嘗試實踐養生之術；二十四歲罹患重疾之際，亦據其自述，曾依《周易參同契》所載養生法調治，而獲一定療效。⁹

⁶ Joo-back Kim, *A study on Sangchon Shin Heum's poetry*, Ph.D. dissertation,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1997, p.17.

⁷ 金光年，「象村申欽散文研究」，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14，pp.167-168.

⁸ Yeon-seok Eom, The Correlative between Sang Chon Shin Heum's emblemo-numerology and moral-principle science of *I Ch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PHILOSOPHY IN KOREA*, 48, 2017, pp.6-7.

⁹ Eun Jeong Kim, "A Special Issue Interpretation on Confucian Scriptures in Sino-Korean

此種親身經驗，使申欽之易學取向不囿於當時學界主流之義理之學，而能融攝象數之學，以求通於身心修養與生命實踐之層面。換言之，其將《周易》視為可資實踐之生命之學，實與其疾病體驗及養生實踐密切相關，並非偶然之思想選擇。

申欽所處之朝鮮中期，乃王權結構與政治正統性反覆重組之歷史節點。自宣祖、光海君至仁祖之政權更迭期間，國家秩序持續處於緊張與調整之中。申欽於此過程中，無論在制度性官僚體系抑或私人網絡層面，皆與王室形成密切而多重的關聯。其與素嗜《周易》之宣祖，¹⁰ 不僅為共議國政之政治同道，亦為文學上相互切磋之文化夥伴；復以其子申翊聖尚公主，進一步強化其與王權核心之結構性連結。申欽曾奉宣祖之命撰上〈進古經周易筮〉，¹¹ 嘗試將《周易》義理轉化為診斷時局與論述治道之理論框架，藉經典話語介入現實政治，並以易理為王政運作提供正當性與思想資源。¹²

Literature A Study on Literatures borrowing means of divination in early 17th Joseon(朝鮮) Dynasty -Centering around ShinHeum(申欽)-", *Journal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45, 2010, pp.82-83.

¹⁰ 關於宣祖素嗜《周易》之實，可見諸於〈宣祖大王誌文〉之記載。“晚而好《易》，雖在搶攘，誦讀不輟。”（《朝鮮王朝實錄》221卷〈宣祖大王誌文〉）
https://sillok.history.go.kr/id/kna_200003

¹¹ 申欽奉宣祖之命，撰上〈進古經周易筮〉。文中明確指出，王政之施行可以《周易》為理論依據與治道資源，強調經典不僅為義理之書，亦蘊含可資治理實踐之原則。同時，申欽並追溯其易學思維之思想淵源，指出其理論傳承可上溯至程子之心學傳統，藉此確立自身詮釋立場之正統性與學理根基。「伏以天心純佑。大亂獲夷。群生拭目。望治已久。殿下迺能於宵旰之餘。典學有加。超然獨契於犧文之神理。其範圍天地開物成務之意。可謂至矣。是誠貞元之會。否泰之交。亦殿下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推是心也。何患乎治之不弘而化之不成也哉。……向非程朱傳義之縷析毫分。開之以理。則潔淨精微之蘊。幾乎晦矣。先儒有言曰。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又曰。先天圖。乃心學也。」（《象村先生集》卷32〈進古經周易筮〉）

韓國古典綜合DB ITKC_MO_0286A_0360_010_0020_2003_A072_XML

¹² 「嗚呼。陽數一而陰數二。故從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此聖人之所憂。而於消長之節。未嘗不致謹者也。其轉移變通。會其有極。俾斯世斯民。躋之大有之盛。而免於未濟之難者。此實臣等區區有望於聖明者也。伏見近者天災地異。沓臻層見。民艱政瘼。日滋月甚。壞裂之世道。凌夷之紀綱。若涉大川。浩無津涯。而臣等之所恃。惟在殿下天德。有臨。而舉以措之爾。伏願聖明留神焉。臣等不勝惓惓之至。取進止。」（《象村先生集》卷32〈進古經周易筮〉）

ITKC_MO_0286A_0360_010_0020_2003_A072_XML

宣祖臨終之際，曾囑託七名所謂「忠臣」，輔護其幼子永昌大君之後事，申欽即為其中之一，世稱「遺老七臣」。此一政治託付，使其在王權繼承問題上，與王室核心利益產生更為密切之關聯。然宣祖崩逝之後，政局急遽變化。永昌大君終遭殺害，而以擁護永昌大君勢力為對象之大規模政治整肅——癸丑獄事（1613）亦隨之爆發。申欽因曾支持永昌大君之立場而遭罷黜，自此於光海君在位期間屢受政治壓抑與排擠，仕途備受掣肘。此一政治挫折，不僅改變其仕宦軌跡，亦對其晚年思想取向與學術關懷產生深遠影響。

在放逐與誣陷交織的歷史處境中，《周易》遂成為其重新理解世界與自我之思想媒介。若說早期之易學關懷偏重經世論政，則此後之易學實踐更趨向於身心轉化與生命觀照。《周易》在其筆下，不僅為解釋時勢之理論工具，更為承受苦難、重建主體性的精神資源。易理遂由政治話語轉化為內在修養之依據，形成經世與修身雙重向度之交錯。

因此，本文主張：申欽之易學思想，並非靜態的理學立場，而是一種在家學傳承、身體經驗與政治危機多重力量交織下所形成的動態實踐。其易學之核心意義，不在於義理與象數孰為主導，而在於《周易》如何在歷史斷裂時刻，被轉化為可資行動與承擔之思想資源。

基於此問題意識，本文將以癸丑獄事之後所撰若干關鍵文本為分析核心，考察申欽如何透過易學語彙重構自我敘事、詮釋政治失序，並完成由「經術論政」向「經學修身」之思想轉向。透過此一考察，本文旨在重新定位申欽於朝鮮易學史中的意義，並提出一種理解經典作為危機時代生命實踐之理論視角。

三、政治危機的易學轉譯與空間化實踐——申欽坎止窩的象數結構分析

申欽於癸丑獄事（1613）中遭流放。此一過程對其而言，不僅是幾近危及生命之重大危機時刻，亦是其內心深感冤抑、¹³乃至自比於屈原之精神轉折點。¹⁴其後，他

¹³ “在田舍凡四年，日得京信，非告變殺人，必論啓黜人。此以吾輩四人為注，期於刈翦而後已。自古以來，機變之無窮，未有如此時者。”（《象村稿》卷55 漫稿第6「春城錄」）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0600_010_0010_2003_A072_XML

¹⁴ “淚作竹間血，冤歸江上濤。悠悠千古恨，付與左徒騷。”（「詠懷」）《象村稿》卷17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0220_010_0470_2003_A071_XML

旋即離開漢陽，遷居至父親故鄉金浦象頭山附近。面對實存性的威脅、政治上的試煉以及處境之不公與荒謬，他所選擇的回應方式，並非直接抗辯或外在對抗，而是透過窮究《周易》之義理與象數體系，反思自身於現實之中應當採取之倫理立場與行動態度。

此一突發之政治變局所引發的心理震盪，亦可從其書寫實踐之變化中加以觀察。滯留金浦期間，申欽創作時調體連作〈放翁詩餘〉。作為以漢文創作見長之士大夫，其於此階段留下韓文連作詩篇，此一現象在文學史脈絡中具有值得注意之意義。相關研究多將此視為流放處境下之文類轉向。此種形式變化，或可與當時政治語境及書寫風險之考量相關聯。¹⁵ 然而，申欽並未因此中止漢詩創作，亦持續研讀《周易》，並致力於象數之學的探討。是以，其韓文創作之出現，並不必然意味思想重心之轉移，而較可理解為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對不同書寫媒介與表達方式所作之調整。此種文類並行之現象，顯示其書寫活動並非單向轉折，而呈現多層次並存之特徵。

癸丑獄事翌年甲寅，申翊聖於金浦為父構築可供靜思之居所。該空間形成於申欽生命中極為困頓之階段，因此在其後續書寫中逐漸獲得象徵性意涵。申欽並將營建過程記錄於文，相關記述不僅提供空間形構之細節，亦為理解其當時思想活動的重要文本材料。

「坎止窩之南有潺流。源出歌絃山。大旱不絕。而荊榛叢穢。石錯無逕。自余來此。斧其林莽。疏其川脈。累石為砌。葺茅一間。匯下流為池者二。而中築堤。堤傍植柳十餘株。上池之北隅又築小臺。向之陋污者頗改觀。既成。以一絕記之。」（《象村先生集》第20卷）¹⁶

小堤纔受兩床橫
亭下悉池鏡樣明

¹⁵ Ki-Ok Sung, The Study of Sin-Heum's Sijo, "Bang-ong-si-yeo(放翁詩餘)".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Studies*, 49, 2020, p.319. 根據 Sung 的研究，申欽之時調呈現出脫離載道傳統、帶有道家思想取向以及偏重遊興抒寫之特徵，其風格與十六世紀時調既有規範形成明顯差異。基於此一觀察，Sung 認為，申欽之創作在當時文學發展脈絡中展現出某種轉型意義，因而可被視為推動時調表現範式變化的重要作家之一。

¹⁶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BT_0286B_0210_010_0290_2002_003_XML

沙岸柳堤春欲晚

落花芳草總詩情（《象村先生集》第20卷）¹⁷

居所建成後，申欽題詩以記，其詩語可視為理解其當時思考取向之重要線索。

「小堤纔受兩床橫」所描繪之狹窄「小堤」，上下為水（三）所環。若置於易學語境中觀之，水常與險難相關；然而詩中之水呈現為「鏡樣明」，使險象轉化為可供觀照之存在。此一書寫策略，顯示其並未迴避險境，而是透過審視與內化，使之成為反思經驗之媒介。「沙岸柳堤春欲晚」一語，表層上固然描寫時序流轉、春意將闌之景象，然其語義所指並不限於自然時節之推移，更隱含對如春光般盛時已逝之感喟與自況。並透過「落花」與「芳草」之並置，構成消逝與延續交錯之圖景。自然意象因而不僅營造情境氛圍，更構成對變動處境之詮釋框架。詩中景觀的安排，已預示空間與卦象結構之潛在對應。

其實際空間配置為：上下兩池，中築一堤，堤旁植柳，北隅築臺。若與坎卦（三）之結構對讀，則可見形式上的同構關係。坎卦為陰（--）一陽（—）一陰（--），上下皆水；坎止窩則形成「水—堤—水」之空間序列，中軸之堤對應居中之陽爻。此種形制並非單純自然地貌，而是經營構而成之結構安排，使卦象之抽象陰陽關係轉譯為具體空間秩序。尤值注意者，在於池水「大旱不絕」之記載。此一描述，使水不僅為景觀元素，而具有持續性險難之象徵意涵；而中央之堤則提供穩定支點，構成險中持守之結構。由此觀之，坎止窩可被理解為坎卦之空間化實踐——其意義不在逃避危險，而在將險境結構化，使之成為倫理自持與思想反省之場域。

此一空間意識亦反映於命名行為。當申翊聖詢及居所之名，申欽命名曰「坎止窩」。¹⁸「坎」取義於《周易》坎卦，象徵重險；「止」則指涉節制與自持。命名本身遂構成一種概念化行動，使具體處境被納入易學語彙之詮釋框架。坎止窩既成，其思想活動亦隨之展開。相關記載如下：

¹⁷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BT_0286B_0210_010_0290_2002_003_XML

¹⁸ “以甲寅之夏。奉親闡安宅之。因請名之。命以是名焉。小子以樽酒簋缶。觴于坎止之亭。”（《樂全堂集》卷7「坎止亭記」）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335A_A093_260H_IMG

「甲寅。築舍於山麓。穿沼種樹。命其居曰坎止窩。深居不出。超然物表。左右圖書。專意探頤。一日取性理大全邵子經世數觀之。忽若開悟。遂窮象數。著先天窺管。後購邵子大全於燕市。參合之。無不契者。」(《象村先生集》附錄1)¹⁹

此一命名行為本身，已顯示其試圖透過概念化之語彙回應當前處境。若結合其相關自述與後續書寫觀之，「坎止」或可理解為在險難環境中確立行止分際、持守其志的象徵性表述，亦隱含對未來情勢轉圜之期待。坎止窩建成之後，申欽持續閱讀群書，探究世理，並進一步研讀邵雍《皇極經世書》，自述由此體悟象數之學的義理結構。此一思想歷程，使其居所命名不僅具有指涉現實處境之意義，更與其易學思考密切相關。換言之，「坎止窩」並非單純空間標識，而是與其經學理解與自我定位交織形成的象徵性命名。

其中，「坎」取義於坎卦；「止」與「窩」亦各具層次意涵。三字並置，構成一組具有易學背景與處境指涉的概念結構，成為理解申欽當時思想狀態與倫理姿態的重要線索。接續之，本文將對「坎止窩」三字之意涵進行具體而細緻之分析。

其一，論「坎」之義。就其所象徵之現實處境而言，坎之為象，意味由一陷阱復墮更深之陷阱，故六三爻辭有不可妄動之戒。申欽體悟此義，乃收攝其對世務之關懷，「深居不出」，專事於多方面而深層之閱讀。

「坎止窩」既為專名，亦為其居所之名，而其中每一字皆寓含重要意義。首先當論「坎」字。此字所指，即《易》之坎卦。從字形觀之，「土」有所「欠」，呈地勢凹陷之形。朝鮮時代儒者丁若鏞曾加以說明，指出土若深陷，則可成海成水；若陷而狹小，則為坑阱與陷穽，其義在於「險」。²⁰ 坎卦為四大難卦之一，主險難之象。其中習坎卦，上卦與下卦皆為水（水），象徵內憂外患、進退兩難之危機境遇，與申欽

¹⁹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A072_418H_IMG

²⁰ 朝鮮時代之儒學者丁若鏞對坎卦作如下之闡述。「坎者，土欠也。大地圖圖，其有欠闕者，為坎窞也。開闢之初，水土渾淪，其有坎窞，水則就之，大窞則為瀛海，小窞則為溪澤。此坎之所以為水也。又坎者，險也。物之險者，莫如巖石，故巖之與險，義本相通，坎者，險也。」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P_0597A_0680_010_0030_2014_015_XML

當時所經歷之現實處境頗為相應。

然而，坎卦亦為六十四卦之中唯一言及「心亨」者。此語之意，在於雖處困難，仍可憑藉內在之心志而得以通達。換言之，困厄固然存在，但其是否能被克服，繫於主體之心境與持守。當前之關鍵，並不僅在於險難之客觀存在，而在於身處險難之中，是否能守持其心之中心而不失其正。該爻辭同時揭示其所面臨之現實困境與忍耐自持之工夫意涵，與申欽之境遇可謂相當契合。申欽對坎卦之義理，曾加以深刻思索。其子申翊聖在思考此一宅號時云：「《易》曰：『習坎以常德』，又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非名吾亭之義乎？小子於是而意寓蓋極深矣。」²¹ 此可知，申翊聖已深切體會其父命名之用意。

呈現多重而層疊之當下苦痛，以及主體所應持守之心態之「坎卦」，在申欽所選擇棲居之荒涼空間中，被具體形塑為可見之建築構造。²² 就其實際空間配置而論，上下各有一池，中間築以小堤，堤畔植柳，北隅復構一臺。若將此一空間格局與坎卦（☵）之結構相對讀之，則可發現形式層面之同形對應。坎卦之卦象為陰（--）一陽（—）一陰（--），上下皆水；而「坎池臺」則構成「水—堤—水」之空間序列，其中居於中軸位置之小堤，正可對應中央之陽爻。此種形制並非自然地貌之偶然呈現，而是經由規劃與營構所形成之結構性安排，乃將卦象中抽象之陰陽關係，轉譯為具體而可感之空間秩序。

尤值注意者，在於文獻記載兩池之水「大旱不涸」。此一描寫使水不再僅為景觀元素，而被提升為持續性艱難之象徵意涵；中央之堤遂成為維繫穩定之支點，形構出一種「險中持守」之結構。另有不可忽視之處，乃堤上植柳以增其風致。依坎卦之義

²¹ 《樂全堂集》卷7「坎止亭記」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335A_A093_260H_IMG

²² 關於坎止窩與《周易》之關聯，既有研究論述如下。Ha-Youn Cho, *The Time and Space of Creation of <Bangongsieo> an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in the Work*. Korean Literature Education Research, 72, 2021, 297-333.; Eun Jeong Kim, "A Special Issue Interpretation on Confucian Scriptures in Sino-Korean Literature A Study on Literatures borrowing means of divination in early 17th Joseon(朝鮮) Dynasty -Centering around ShinHeum(申欽)-", *Journal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45, 2010, pp.79-111. 既往研究雖曾提及『坎止窩』與《周易》之關聯，並嘗試依據《周易》原理進行深層詮釋，然兼具建築構造、文學表現與易學視角之綜合性考察，至今仍屬鮮見。本文試圖在此基礎上提出不同於以往之探討維度，期能彌補既往研究之不足。

理詮釋，兩池之水象徵困厄、陷阱與當下之苦難；然穿行其間之小堤所植之柳樹，則為整體空間增添更為複層之象徵意涵。柳在文學傳統中本具豐富意義，而滋養柳樹生長之水，亦正是曾令其身心承受痛楚之來源。換言之，苦難之水同時成為生命滋長之資源。

由此觀之，「坎池臺」可被理解為坎卦之空間實踐。其意義並不在於迴避危險，而在於透過對險境之結構化安排，使之轉化為倫理自持與思想反省之場域；亦即，在不可消除之險難之中，建構一套足以安頓自我之象徵與實踐秩序。

其二，「止」之義構成「坎止」思想之另一核心向度。此字不僅屬卦象語彙，更指向一種反省與自我節制之倫理姿態。申欽之體悟，可由〈坎止窩銘〉窺見。文中反覆出現「止」，並以「上不及仲尼」「下忤於士師(柳下惠)」自陳其儒者行履之不足；「坎而後止」尤為關鍵，指出其止乃經險難而生，而非預設之退隱。然此止並未止於愧懼，而轉入「維心之亨」，呈現由困厄而達內在通達之轉折。「止於所止」標誌行止界限之自覺，其理想則歸於「樂天知命之君子」之境。

「時止而止。上不及仲尼。援之而止。下忤於士師。坎而後止。其行恥也。維心之亨。其素履也。止於所止。竊庶幾樂天知命之君子。」(《象村先生集》第31卷，「坎止窩銘」雜著)²³

申翊聖〈坎止亭記〉則將此義提升至《易》之時用框架：「夫維心亨行有尚者，處坎之道而時用之義大矣。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止，各止其所止也。至若遇禍災，曷可道哉？天幸得脫於文罔，而又得此居室之有成，則父子煦煦然相悅，輒喻以流行坎止之義，安於所遇而不惱，樂夫天命而不違。」²⁴ 止因而被置於行一止之動態結構中，成為合乎時義之選擇，而非消極退避。父子對「坎止」之反覆詮釋，使其由命名語詞轉化為理解禍患與安頓身心之理論資源。

總而言之，「止」在此既為易學範疇，亦為時間倫理之實踐原則。透過對《易》義理之內化，個人困厄被納入時勢與天道之結構之中；坎止之義遂成為一種以時義節制行動、於險境中確立主體位置的生命方法。

²³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BT_0286B_0320_010_0110_2002_004_XML

²⁴ 《樂全堂集》卷7「坎止亭記」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335A_A093_260H_IMG

其三，申欽於居所之名中特置一「窩」字。「窩」本指低凹隱蔽之所，如穴如巢，多寓狹小而幽靜之意。以此為名，實可視為其自處謙抑之象徵。坎止窩既為其度越艱困歲月之場所，亦為其靜觀自省、暫息身心之一隅小室。申欽正是在此一近乎隱伏之空間中，融攝《周易》之義理，以之為精神資源，從而穿越動盪險難之時局。另一方面，申翊聖於坎止窩之南側引水成渠，復構築一小舍。申欽為之命名曰「渙庵」。「渙」字取義於《周易》之渙卦（䷺）。²⁵ 渙卦之象，上為風，下為水，有風行水上、波流分散之形。卦辭曰：「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其基本義為散解、離散，然實具雙重向度：一則象徵人心離散、家道衰替或政局乖離；一則亦指鬱結得解、嫌隙消融。若能因勢利導，使渙散之氣得以調和，則人心復聚，邦國可期於安泰。²⁶ 上九爻辭曰：「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意謂將積鬱與禍患驅散，使之遠去，則可免於咎責。此在義理上可理解為去害遠禍，使陰翳之氣消散，轉危為安之象。²⁷ 若申欽自居之所名以「窩」，其子之居則名以「庵」。二字皆指簡樸微小之棲身之所，無宏敞華麗之意，而寓含退藏自守、謙沖自持之精神姿態。於政治風波甫定之際，以「窩」「庵」為名，不惟標示空間形制之樸實，更彰顯其父子有意自抑聲名、遠離喧競之處世立場。

綜上所述，申欽面對政治危機，並未僅以情緒或隱逸回應，而是透過《周易》之象數架構，將個人困境重新納入變易之秩序之中。坎止窩的營構，使卦象結構具體化為空間形式；「止」則使危機轉化為倫理工夫；渙庵則標示危機之後的疏解與重構。此一案例顯示，朝鮮中期易學不僅為義理詮釋之學，更具有將歷史創傷空間化與倫理化之實踐能力。易學於此既是思想資源，亦是存在論與行動論的轉譯機制。透過卦象、建築與書寫之交織，政治危機遂被轉化為可理解、可安頓、可修養之生命課題。

四、申欽《穿井記》中的《周易》思想與倫理自我調適

癸丑獄事後，申欽雖一度復仕，然於光海君九年（1617）因反對廢黜永昌大君之母仁穆大妃而再度陷入政治危機。此一事件被視為其政治生涯與個人處境中最為嚴峻

²⁵ Eun Jeong Kim, *ibid.*, p.95.

²⁶ 南東園，《周易解義》（Ⅱ）（Seoul: NANAM, 2003），p.529.

²⁷ 王弼，任采佑譯，《周易王弼注》（Seoul: Gil Publishers, 2000），pp.444-449.

的轉折之一。當時申欽年五十二歲，處於春季放逐狀態，並於此期間對邵雍易學展開更為深入的研究。²⁸ 易學思考遂成為其理解現實處境與重構倫理態度的重要思想資源。

同一時期，申欽寓居壽春戶長之舍，撰寫記文²⁹〈穿井記〉。該文在結構上具有非傳統特徵：前半部分之敘事被有意壓縮，取而代之的是與客對話之形式，使文本焦點由事件敘述轉向自我處境之反思與倫理態度之探討。此種文體選擇可視為對既有記文書寫規範之突破，亦反映其在困境中尋求思想表達新形式之嘗試。³⁰ 此可視為一種試圖突破既有思維框架與文類範式之文學實驗，亦不排除其反映出主體在困境中尋求新方向之心理動因。本文即擬藉由對該文本之細讀與詮釋，進一步探究作者究竟意欲彰顯何種思想旨趣與內在關懷。

首先，申欽以「穿井」之具體行動作為敘事起點，使文本明確排除直接的政治評論或情感宣洩。記文開端即說明其穿井之緣由，藉由具體實踐引入對生存條件與倫理態度之討論。此種寫作策略顯示其有意將個人政治處境與文本主題保持距離，轉而聚焦於更具普遍意義之生活與思考課題。

「余逐于朝，繫于壽春，寓戶長朴善蘭家。家舊無井，汲泉流飲之，當夏則病其污而溷。余諏諸邑之老，浚于家之西北隈，甃而貯之，甜白澄澈，有源而不竭，喜與主人共之。」（《象村稿》卷22「穿井記」）³¹

從表面觀之，記文開端所呈現之「事實」屬日常敘事：該村因缺乏井水，居民需自泉

²⁸ “余少時，喜觀邵易而未領其要。思索而復置之。如是者，蓋數十年。世無名儒碩師，究窮乎此者，亦無緣就質而擊蒙矣。暨萬曆癸丑，得罪于朝，竄跡田間，無他隨身物。祇有皇朝諸學士所纂性理大全，在床上捐佩之餘，取經世約法。觀之則忽若有所通曉。”（《象村集》「先天窺管」）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KH_G08806_0030_0150_2025_088_XML

²⁹ 朝鮮時代的「記文」在文體規範上相對寬鬆，其結構通常以敘事為先，隨後再附加作者之論述與評議，形成敘事與議論並置的書寫形式。Kwangnyeon Kim, A Study on the Ji(記) style prose of Sangchon Shin Heum. *The Comments on the Korean Classical Texts*, 24, 2018, pp.204-205.

³⁰ Kwangnyeon Kim, *ibid.*, p.218.

³¹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0270_010_0070_2003_A072_XML

取水以供飲用，然夏季時水質易受污染而產生衛生問題。為解決此一困境，申欽與村中長者商議後，以磚石築井，終獲一口水質清潔且常年不竭之井水。此種以「穿井」為題之記錄看似日常事件之書寫，然而其文本結構與義理指涉實具有值得關注之學術意義。

其一，文本透過並置「水」之污染與淨化兩種相對狀態，構成一組具有象徵與思想意涵的對照結構。「水」作為生命之本源，在道家思想脈絡中被視為德性之象徵；依老子之觀點，水雖柔弱卻能勝剛，乃至德之體現。³² 新井所呈現之「甜」、「澄澈」與「有源而不竭」等特質，並非單純的自然描述，而可理解為對既有污染與病態狀態之修復與更新的象徵性表述。此種書寫方式使井水之淨化成為更廣義的倫理與象徵意義的載體，指向社群生活與環境秩序的再生可能。

其二，題名選用「井」字可被理解為對《周易》〈井卦〉之潛在指涉。「穿井」既屬日常生活行為，亦具文學象徵功能，可視為迴避直接政治評論的一種書寫策略。作品的文學性體現在對虛構成分的策略性借用：文本中的「虛構」並非脫離真實，而是以反諷方式揭示更深層的現實意涵。所設置之「客」屬虛構角色，³³ 其對話式結構在提升敘事真實感之同時，也作為作者自我省思與思想呈現的媒介。此一書寫策略不僅顯示作者對《周易》義理的學術理解，更彰顯其試圖將經學思想轉化為生活實踐之智慧。客所提出之論述實可視為對井卦卦義與爻辭的詮釋，同時隱含以易學框架對申欽未來處境的象徵性預測。

將《周易》作為占書文本加以積極運用，屬象數易學發展之重要趨勢，亦可視為申欽易學觀之具體體現。相較於朝鮮初期以義理詮釋為核心的易學傳統，申欽被評價為引入象數思維以調和經義與實踐的關鍵人物。他在《周易》理解中納入實踐與操作取向之象數學方法，進而被視為朝鮮後期象數易學發展之橋接者與思想轉化者。³⁴ 其

³²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老子》第8章）“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第81章）

³³ Kwangnyeon Kim, *ibid.*, p.218

³⁴ 根據 Jeon 之研究指出，申欽於《周易》之理解中，積極引入象數之學，其目的在於強化易學之實踐向度與現實應用性，而非僅止於義理層面的抽象詮釋。（Jeon Jae-gang, "Sangchon Shin Heum's Confucian Thought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義理與象數並重的易學理解方式，同樣體現於〈穿井記〉之文本結構與思想指涉中。

「俄有客來語余曰：『在易之井之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蓋井，養而不窮也。養者，非直自養也，養民也。養民也者，君子之事也，而初六泥而不食，九二甕而敝陋。至三而始渫，至四而始甃，五而乃食，上而乃孚。其德甚盛，而其功甚艱。今茲之井已渫矣，其甃其食其孚，蓋將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比子之身則蘊道泊德，而猶有不食之惻，其不類於茲井之渫而不開乎！元吉在上，王明受福，則吾將以茲井之勿幕，卜子之離祉也。」（《象村稿》卷22「穿井記」）³⁵

政治情勢相當危殆的背景下，可觀察到申欽在撰寫此段文字時採取極為審慎的書寫策略。文章開端的敘述以「客」之語言展開，藉由客對《井卦》的解釋指出，井象徵養民之道，亦屬君子應盡之職責。隨後文本列舉各爻辭並加以詮釋。若將此解釋與現實情境相對照，初六爻所言「井泥不食」可被理解為混亂且污濁的現實處境，因而成為「穿井」（開鑿水井）的動機來源。

接續文本中，「客」指出新鑿之井尚未可飲用，且水缸陳舊破損（九二）；然而透過清理井水（九三）並築造井壁（九四），終於達致可飲用井水之狀態（九五）。文中進一步主張井水充盈而不致枯竭（上六），藉此對現狀作出樂觀詮釋，認為經由清理與整備，未來將可達到可用之狀態。此種詮釋隱含對現實政治情勢的隱喻：當前

Literature 53, 1992, pp.309-333)另一方面，Seo 則認為，申欽在既有偏重義理之易學傳統中凸顯象數意義，從而開展出一種趨向平衡的理解路徑，使《周易》之義理與象數得以相互發明(Gun-sik Seo, *The Study on Sun-chon I-Xue by SangChon Shin-hum, The study of the Eastern Classic* 20, 2004, pp.195-218)。Eom 進一步指出，申欽並未偏廢其一，而是採取象數易與義理易相互補充的整合態度，呈現出複合型的詮釋取向(Eom, Yeon-Seok, “The Correlative between Sang Chon Shin Heum’s emblem-numerology and moral-principle science of *I Ch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PHILOSOPHY IN KOREA*, no.48, 2017, pp.5-35)。至於 Kim，則強調申欽對義理之學同樣懷有深厚興趣，顯示其易學關懷並非單向度的象數傾斜。(Kim, Kwangnyeon. *ibid.*, p.222.)

綜合上述討論可見，申欽深受家學傳統之薰陶，對義理與象數兩端皆有扎實根基。然在身處困厄與政治變局之際，他尤為積極地將象數思維轉化為回應現實處境之資源，從而推動象數之學由理論層面走向實踐層面。此一取向，不僅體現其個人易學立場的整合特質，亦對朝鮮後期象數易之應用化與實踐化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³⁵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0270_010_0070_2003_A072_XML

混濁的政治環境與申欽所面臨的困境，猶如不可飲用之水，但「客」的解讀仍預示其政治復歸的可能性。然而，申欽並未全盤接受「客」的解釋，而在文本中作出回應，其具體答覆如下：

「余笑而對曰：『有改邑，無改井，井何求焉；汲以來者其望深，汲以往者其欲充，井何與焉？盈而出之，則不以汲而喪其盈；虛而受之，則不以不汲而恒於虛，汲與不汲，井固無事於其間也。之井也不處於通衢大術之中，而處於巉岩邃壑之間，不顯於列肆齊民之用，而顯於畸人彙客之所，其體與用，信有似於余之履也。用與舍，未嘗不與井同，而又未始不擊於天也，則余亦無事於其間也。姑與子，撝芳芷薦河藻，酌一勺而酬之。』」（《象村稿》卷22「穿井記」）³⁶

在此文中所出現之「我」，實即申欽自身；「我」之應答，亦可視為其內在思考的展開。若此前「客」側重於井水之可飲與否等功利層面的判斷，則申欽之回應則轉向井之「處境」本身。他指出，無論井處何地、為誰所用，井之為井，其本體並不因外在條件而改易。藉由將井之處境比附於自身遭際，他進一步申明：井之體與用，無論顯達或廢棄，終究繫乎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完全主宰。是以，人不應隨外在條件而悲喜起伏，而當安於當下之境，於既定處境中自得其所。

此一回應，一方面可理解為其不願再度陷入黨爭漩渦的自覺姿態；另一方面，亦呈現出帶有老莊意味的超然視角，即在不可控的外在壓力之下，保持內在心性的安定與自守。此種態度，實為其晚年所一貫持守之精神立場。其言「用與舍，未嘗不與井同，而又未始不擊於天也，則余亦無事於其間也」，明確指出：如井水之被汲取或棄置，皆由天命所定，人於其間實無可強為。然此「無可奈何」並未滑向虛無或絕望，反而轉化為一種積極的存在態度。故又曰：「姑與子，撝芳芷薦河藻，酌一勺而酬之」，即使現實充滿乖舛，只要為天所予，便當坦然承受，並於困厄之中尋求可安頓身心之片刻清明。³⁷

³⁶ http://db.itkc.or.kr/inLink?DCI=ITKC_MO_0286A_0270_010_0070_2003_A072_XML

³⁷ 此一生命態度，在其為同歷癸丑獄事之難的朴東亮（號寄齊）所撰〈寄齊記〉中表現得尤為鮮明。該文融攝老莊思想之旨趣，呈現出超越榮辱得失的精神境界，不僅反映申欽對困厄處境的深層體悟，亦顯示其在政治創傷之後，透過思想轉化而完成之主體重構與心性超拔。Kwangnyeon Kim, *ibid.*, pp.223-227.

透過將「穿井」之日常經驗與《周易》義理加以結合的文學書寫，申欽完成了一種自我觀照的思想實踐：個體之被用或被棄，乃天命之流轉；而自身所能持守者，唯如井之本質般澄澈不變。此不僅展現出其不為外物所動之生命態度，亦標誌其思想由政治挫折中沉澱而出的成熟與深化。

五、結語

本文以《周易》在朝鮮中期之接受與轉化為核心問題，透過「漢文四大家」之一的申欽之生命經驗與文學實踐，探討經典如何在政治動盪與個體危機之中被重新語境化，並轉化為士人主體性建構的重要資源。本文指出，《周易》在朝鮮並非僅作為義理詮釋之經學文本存在，而是在歷史壓力與思想轉型的交錯中，逐漸發展出結合象數思維與文學表述的複合形態。

朝鮮以儒學為國家意識形態，其經典體系之運作本具有高度規範性。然而，《周易》因其兼具義理與象數、哲理與占筮之雙重屬性，使其在不同歷史階段呈現出差異化的詮釋取向。前期以義理為正統，對術數傾向持警惕態度；及至中期，內憂外患頻仍，政治秩序與宇宙秩序之間的張力日益凸顯，象數思維遂獲得新的思想空間。申欽正處於此一轉型臨界點，其易學取向與文學創作共同構成義理易向象數易過渡的具體實踐形態。

作為與宣祖關係密切之重臣，申欽親歷王朝權力結構的震盪；宣祖崩逝後政局劇變，尤以仁祖反正前後之政治重組為轉折點。流放經驗不僅改變其仕途，更促使其將《周易》由經學知識轉化為生命實踐。坎卦與井卦之思索，不再僅是象數詮解，而是對苦難處境的倫理回應與存在反思。《周易》在此過程中完成由「國家經典」向「個體心性資源」的轉譯，其象徵系統則經由詩文書寫而審美化，形成經典知識的文學化再生產。

因此，本文所揭示者，不僅是申欽個人思想之變化，更是一種經典運作模式的轉型：當政治秩序出現裂隙，經典並未失效，反而透過象徵與隱喻的再編碼，進入文學場域，成為士人面對歷史創傷時的精神支點。此一過程顯示，《周易》在朝鮮中期完成了從規範性義理經學向存在性思辨資源的結構性轉換。

從更宏觀的東亞思想史視角觀之，此一轉化亦提示我們：經典並非靜態傳承之文

本，而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中被不斷重構的意義場域。朝鮮士人對《周易》的吸收更呈現出政治經驗與文學感性高度交織的特質。申欽之案例，提供了一種觀察東亞經典跨文化流動與在地化重構的重要窗口。

總而言之，透過對申欽放逐期作品之細讀與思想脈絡之重構，本文論證：《周易》在朝鮮中期並非單純的經學延續，而是一種在政治危機中被重新活化的象徵資源，其文學化轉譯既重塑了士人主體，也為後期易學發展奠定了精神基礎。此一研究雖以個案為中心，仍有待進一步與申欽前後文人易學實踐作比較分析，方能更全面描繪朝鮮易學由義理中心向象數與文學交融發展的動態軌跡。然而，申欽之實踐已清楚顯示：經典之生命力，正在於其在歷史斷裂之際所展現的再生能力與轉化潛勢。

引用書目

- 南東園, 《周易解義》(II)(Seoul: NANAM, 2003), p.529.
- 王弼, 任采佑譯, 《周易王弼注》(Seoul: Gil Publishers, 2000), pp.444-449.
- 孫雍長 注譯, 《老子》(廣州: 花城出版社, 1998)。
- 金光年, 「象村申欽散文研究」, 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 2014, pp.167-168.
- Jae-gang Jeon, "Sangchon Shin Heum's Confucian Thought and Literary Theory" *The Kore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53, 1992, pp.309-333.
- Gun-sik Seo, The Study on Sun-chon I-Xue by SangChon Shin-hum, *The study of the Eastern Classic* 20, 2004, pp.195-218.
- Kwangnyeon Kim. (2018). A Study on the Ji(記) style prose of Sangchon Shin Heum. *The Comments on the Korean Classical Texts*, 24, pp.204-227.
- Ha-Youn Cho. (2021). The Time and Space of Creation of <Bangongsiyeo> and the Psychological Change in the Work. *Korean Literature Education Research*, 72, 297-333.
- Ki-Ok Sung. (2020). The Study of Sin-Heum's Sijo, "Bang-ong-si-yeo(放翁詩餘)". *Korean Classical Poetry Studies*, 49, p.319.
- Eun Jeong Kim, "A Special Issue Interpretation on Confucian Scriptures in Sino-Korean Literature A Study on Literatures borrowing means of divination in early 17th Joseon(朝鮮) Dynasty -Centering around ShinHeum(申欽)-", *Journal of Korean Literature in Classical Chinese* 45, 2010, pp.79-111.
- Yeon-Seok Eom, "The Correlative between Sang Chon Shin Heum's emblem-numerology and moral-principle science of I Ching, *THE JOURNAL OF ASIAN PHILOSOPHY IN KOREA*, no.48, 2017, pp.6-7.
- Joo-back Kim, *A study on Sangchon Shin Heum's poetry*, Ph.D. dissertation,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1997, p.17.
- Se-hyung Yun, "A Study on the Records of the sejosillok Appearing in The Book of Changes", *The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 & Convergence* 12, 2022, pp.127-155.
- Yong Mok Shin, *A study on the Acceptance of Si Zhu and Feng Shui Idea by Literati in the mid-Joseon: Focused on the Diary of Miam and Mukjae*, Ph.D. dissertation,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2023, p.160.

網絡資料庫

韓國古典綜合DB (<https://db.itkc.or.kr/>)

朝鮮王朝實錄 (<https://sillok.history.go.kr/>)

The *Zhouyi*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the Joseon Dynasty: A Study Centered on Sin Heum

Kang Ha YU
Kangwon National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ile-period writings of Shin Heum(1566-1628), a major literary figure of mid-Joseon Korea, and explores how the *Zhouyi* (Book of Changes) was transformed through his lived experience into a practical intellectual resource, one that was imaginatively reshaped and aesthetically rearticulated in his literary works. By examining his poetry and prose from exile alongside his engagement with *Yijing* thought, the study argues that for Shin Heum, the *Zhouyi* shifted from being primarily an object of moral-philosophical exegesis with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to becoming a framework for responding to political turmoil and personal crisis. It ultimately served as a spiritual grounding for his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and ethical orientation in the world.

Within the highly structured Confucian order of Joseon, the *Zhouyi*—with its dual emphasis on moral principle (*yili*) and image-number speculation (*xiangshu*)—offered a wide range of interpretive possibilities.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intensified in mid-Joseon, image-number thought found renewed intellectual relevance. Shin Heum’s experience of exile marked 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in his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his reflections on the hexagrams *Kan* (坎) and *Jing* (井) moved beyond technical numerological explanation and developed into ethical responses to suffering and deeper forms of existential reflection.

This study further shows that Shin Heum’s exile writings represent an innovative attempt to translate hexagramic thought into symbolic language and spatial imagin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Zhouyi* was transformed from “classical knowledge” into a “resource for living,” as its symbolic system was aesthetically reconstructed through poetic expression. Rather than losing its significance in moments of political rupture, the classical text gained renewed vitality through literary reinterpretation, becoming a spiritual anchor for literati confronting historical trauma. The case of Shin Heum thus offer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on how classical texts are reactivated and reshaped within specific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Shin Heum; *Zhouyi*; Joseon literature; Hexagram Kan; Hexagram Jing; image-number learning (*xiangshu*)